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目录

- 贵阳《力报》改组及查封前的活动……………萧奇富(3)
- 贵阳《力报》事件……………刘裕远(13)
- 贵阳《中央日报》浮沉录……………戴广德(23)
- 贵阳《中央日报》琐记……………程仲文(37)
- 采访片断……………戴广德(44)
- 抗战胜利前后的贵阳《大刚报》……………凌今是(54)
- 我所知道的贵阳《大刚报》……………黄家骥(57)
- 杨森主黔时期的《贵州日报》……………符隐牧(63)
- 谷正伦统治时期的《贵州日报》……………黄家骥(68)
- 《贵州商报》创办概况……………陈培元(76)
- 《贵州商报》回忆录……………傅斯甫(79)
- 记“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马嗣英(95)
- 《贵州晨报》、《力行报》、《时事导报》简介
……………士 耕(100)
- 《贵州工报》的创刊和停刊……………黄 炜(104)
- 我们怎样创办《新世界晚报》的……………杜松竹(113)
- 《小春秋报》侧记……………章正邦(126)
- 《西南风报》与曹儒森……………龙时文(130)
- 记贵阳出版的《时代周报》……………翁祖善(135)
- 寿命短暂的《艺林报》……………魏 岩(145)
- 记《民族导报》……………彭 许(149)
- 贵阳《南明晚报》始末……………赵 晨(157)
- 回忆《民报》晚报二、三事……………竹 青(159)

《幸福报》三日刊掠影……………刘竹青(162)
解放前由民族工商业举办的《励行月刊》……金谷(165)
四十年代报刊的广告业务……………苏鸣(171)
贵阳报刊拾遗补缺……………石生(174)

回忆贵阳生活书店……………邵公文(201)
贵阳生活书店被查封的经过……………周积涵(210)

回忆四十年代贵阳的话剧活动……………林薇(216)

忆解放前的贵州体育……………潘奎龙(226)

四十年代排球赛场的一件丑闻……………李实(232)

两广事变期间贵州抗日救国军记事……………陈集忍(237)

贵阳《力报》改组及查封前的活动

萧奇富（李晓天）

贵阳《力报》原是湖南的《力报》，一九四四年长沙沦陷，由谢迁筑。一九四五年，由李思齐出面，刘熙乙、刘裕远弟兄出钱买了该报的发行权继续出版的一家民间报纸。发行人是平刚，社长是李思齐，副社长是马怀麟，社址设在黔灵山脚刘宅旁边。当时办报的方针是“不作官报尾巴和应声虫，有正义感，独树一帜。”由于这个办报方针的政治目标不明确，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到四七年春，尽管这张民间报纸一年多来在贵阳也曾十分活跃，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元旦增刊，曾将贵州各派系“大团结”的内幕，无保留地公诸于众，挑起杨森组织力量与各派系抗争，似曾“独树一帜”，但又参与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竞选活动，为陈明仙竞选立法委员发表了《论妇女参政》，以及《力报》总编辑曹儒森（笔名小铜炮）在《西南风》上发表的一系列密锣紧鼓地揭发许芳媛的隐私，以配合陈明仙的竞选活动和表演的丑剧等等。但在实质上，仍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派系斗争，并为这种争夺提供了场地。固然，如李思齐说的，是“撕破了脸皮”，但并没有“砸烂派系”。这些也说明李思齐与CC派人物还没有完全割断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增加了程国勋为副社长，而《力报》的发行量却越来越小，以至难于维持。拖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廿二周年纪念的那天，《力报》不得不由对开版

改为四开两版，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负担——为本报改版敬告读者》的社论。然而，改版后的局面仍未好转，到了发不出工资，只能供伙食，而伙食也很差，甚至到了只能喝稀饭的地步了。

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已进行到第二个年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阶段，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报纸还在不断刊登什么“国军转进”的消息。在蒋管区，反动派施行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军阀官僚，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争民主的民主运动和在农村开展了“反三征”（反征兵、反征粮、反征款）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就在这个时候，李思齐以竞选“国大代表”为名，回到水城，和我秘密会见（我本来任水城中学校长，水城县当局奉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密电，认为我是异党分子而追捕我，我只好隐藏起来）。思齐和我本是小学同学，两家又是世交，但在中学时期，由于各人的信仰不同，所以互不来往。这次会见，他推心置腹地将其思想变化，《力报》的景况向我说明，我们又共同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他约我来贵阳接办《力报》。我抱着“避祸和试一试”的心情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也自动放弃了“国大代表”的竞选，于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一同来到贵阳。

到贵阳后，我寄居在导文中学教师毛有光处。毛和我是贵阳师院的老同学，我们又约集贵阳师院中文系毕业的老同学蒙昭、洪之贵、王忠慈、王钰、宋泽民等，蒙昭又介绍

“编报能手”顾希均及顾带来的四二年就与我认识的好朋友张凤鸣，共同研究改组《力报》的事。

五月，地下党的李长青同志由重庆返回贵阳，向我们转告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精神（这两个文件现载于《周恩来选集》上卷二六八至二七一页），内容是：“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的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的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这两个文件，要求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同志和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张友渔同志在撤退前尽可能将此种意见转告隐蔽的同志。正在犹疑不定的我们，聆知这个指示后，鼓舞我们决心参加《力报》，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顾希均说：“喝稀饭也要办报。”张凤鸣说：“我回老家卖掉薄产也要支持办报。”当下决定：“争取做到以报养报。”由我出面与李思齐商定办报的方针是：“抨击时政，增强不满；宣传解放区军民奋战和反攻的胜利消息。”出于策略，公开提出的方针是“半面向左转，向前一步走。”编辑部彻底改组，由我另组班底。

改组后的《力报》，由李思齐任发行人，我任社长，聘顾希均为总编辑，聘张凤鸣、王忠慈、洪之贵、毛有光、王钰、宋泽民等人为编辑；原来的编辑人员只留下周建章和张怀陆，其余的通通解聘。经理部仍由刘荣康担任总经理，肖元杰仍任营业处经理兼管印刷厂，其他职工均无变动。改组后的《力报》，从开始就大踏步前进，销路大增，肖元杰兴奋地说：“我们有力量喝得起一碗稀饭了！”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改组后的《力报》，恢复了对开

四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和《告读者书》，响亮地提出：

“《力报》作为追求真理的园地，望读者来共同发掘真理……为了追求真理，就要揭露丑恶的现实，让黑暗与丑恶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旗帜鲜明，面貌一新。七月三日，《力报》发表了《米价涨，人心危》的社论，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即将崩溃的经济危机，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七月五日，《力报》一方面在一版刊登头条新闻：《府会动员剿共》和《动员剿共提案全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人民民主，践踏和平统一的狰狞面目，在谎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之后，还妄图“总动员”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力报》在同日的第四版，刊登了剪辑文摘《战争与否看史丹林之一念》，对国民党反动派用战争屠杀人民以取得胜利的嚣张气焰，针锋相对地指出：“国际战争从来不是共产主义的工具，阶级斗争却是他们的工具，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终必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获胜。”唤醒人民不要被“总动员戡乱”迷惑、吓倒。只要提高阶级觉悟，坚持阶级斗争就一定胜利；反动派用战争屠杀人民的手段一定失败，胜利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七月七日，《力报》照常发表纪念抗战十周年的社论，对于反动派的“总动员”、“戡乱”等那套反动东西，从此不再刊载了。

七月十六日，发表了《论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稳定》的社论，抨击国民党欺骗人民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竞选活动。七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针对美国特使魏德迈来华支持蒋介石反共，连续发表社论予以猛烈抨击。八月，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抨击国民党所谓“行宪”的实质和抨击时政的文章。其中《论政党提名》一文说：

“青年党、民社党不过是内战的特产、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机构而已。”指出了这两党所谓代表民意的反动本质。《快救人民于水火中》一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奸商豪吏纸醉金迷的糜烂、罪恶生活以及广大人民悲苦生活的惨状。《论日货走私》、《美国的远东市场》、《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重视东方的大变化》等重要文章，揭露了种种阶级矛盾，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勾结的罪行，赞颂了各国民族运动的兴起。

《力报》的新闻稿件，主要来源是转载《华商报》。当时，在蒋管区，都认为这是香港华侨商人资本家办的报纸，和《华侨日报》同样在蒋管区公开发行。我们每天都收到从香港邮来的《华商报》，加以剪辑刊登。解放后，有些好心的同志，不明真象，把《力报》的消息来源，说成是同志们提供的新华社消息。有的明知是从《华商报》剪辑的，却又认为出自外国资本家的报纸，那是不对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一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出《华商报》影印出版，说明是“我党所办的香港《华商报》……封闭之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立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广州占领宣传阵地。《华商报》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复刊，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广州解放时终刊，真象也就大白了。《力报》的新闻另一来源，是《力报》内部电台间或收听到的我解放区发布的新闻报导，变换语气，加以剪裁，写出报导；或在选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稿件中掺入这些资料。总之，以种种机动灵活的方法，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报导各个战场的真实情况，与反动派的御用报纸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稿件最大的特色还表现在：凡是反动派报纸诬称我党、我军为“匪党”“匪军”，《力报》始终用“共党”、“共军”。例如：

“国军退出泰安”、“鲁中共军围攻临朐”、“苏北激战”、“兴化失守”、“保定外围情势紧急”等等，既报导了真实情况，而又态度鲜明。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力报》连续报导了刘、邓大军的胜利消息，例如：《刘伯承部渡河南下》、《刘伯承南下抵淮阳》、《刘伯承部抵大别山》、《大别山将有拉锯战》等等，揭示了胜利的曙光，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坚定了人民的信念。

八月二十一日，《力报》以《战场七月如流火》为题，专栏报导七月份战局的两个特点：“在国军方面，为了显示总动员的威力与欢迎魏德迈，遂在各个战场（东北、河北、特别是山东）发动了进攻。这个特点，在四平街之战结束与山东共军改采越点反攻以后，已经告一段落。所以可说是国军发动了攻势，而又立即转取了守势。在共军方面，对待国军的攻势，先是避开，继则反攻。所以可说是共军先避开锐锋，而立即又转为攻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民党反动派“总动员”、发动全面内战的彻底破产和失败；报道了国民党反动派从四六年七月由全面进攻转入所谓“重点进攻”之后，将山东作为“大重点”集结了九个整编师的兵力，深入沂蒙山区，以期决定全国局势。共军对这场大战，采取三个办法对付。一、以少数兵力留在山区，与国军相周旋，叫做冻结重点；二、以大批主力（据中央社估计为四个纵队）插入大重点后方，占费县、枣庄，并分兵北夺泰安，两路越过津浦线，叫做跳越重点；三、刘伯承主力渡河东进，叫做揭开大反攻的序幕……”。用事实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也行将失败。这篇文章震惊了贵阳山城，报纸被抢购一空，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山城人民争相传阅，奔走相告。

改组后的《力报》，销量猛增，由一千余份增到三千余份，最高达五千余份，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在蒋管区贵阳报纸发行量最多的一家。《力报》的职工，大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朝气蓬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积极全力投入了办好报纸的战斗。顾希均新婚，放弃了欢度蜜月；张凤鸣、洪之贵正在热恋，也都推迟了婚期。特别要提出的是顾希均，他于一九三八年考入铜仁国立三中师范部，在校时即参加了我地下党董国平、陈德昭等同志领导组织的读书会，开展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四十年代初，他到湖南邵阳《力报》，就曾写过“我们共产党人……”论证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必定灭亡。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战斗文章，抨击时政，唤起各族人民觉悟，这说明他当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了。随后，他毕业于广西大学，他才华横溢、思想敏锐、是个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会四国外语，曾向我口译德文版资本论，纠正我英语发音的不准确，报纸大多数社论和新闻报导都出自他手，也有大家集体讨论后由他执笔的。他那艰苦朴素、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将全部心血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工作的精神，感人至深。他沉默寡言，但他那丰富的知识，灵活的策略，敏捷的思路，高水平的文字表达，报社中的人都十分钦佩他。他在《力报》工作时期，是他短短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在《力报》的贡献，对贵州解放斗争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令人永远难忘。

改组后的《力报》，在敌人心脏里连续发起进攻，猛烈地向敌人投枪。敌人并未睡大觉，《力报》改组后不久就被敌人注意上了。《战场七月如流火》一文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国桢立即把李思齐召去，声色俱厉的提出三条要求：一、立即转变立场，不准为

“匪”张目；二、遵照“戡乱法令”，称共产党为“匪党”，解放军为“匪军”；三、改组编辑部，撤销顾希均的总编辑职务。李思齐一条也没有答应，他答复得很干脆：“我们是民间报纸，是民众喉舌，凭事实说话，不能欺骗群众；顾希均是报社聘请的职员，撤不撤是报社内部的事，我们没有向政府领过津贴，政府不能干预报社内部事务。”黄国桢恼羞成怒，狠狠地说：“你们无法无天，那就看着办吧。”

李思齐回到报社后，找大家商量对策，并介绍了被召见的情况和谈话内容，大家一致支持和赞赏他的义正词严的明朗态度，表示“宁可杀头关门，决不改变办报方针。”同时，大家也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顾希均说：“到那时，我们就丢掉笔杆子，拿起枪杆子。”第二天，顾约我去他家早餐，并说下午有几个朋友要来他家商量事情。下午，行商打扮的李长青，水城田粮处的刘安民，关岭教师裴吉甫、贵筑罗济民等人先后来到顾家，他们都是我过去相识而又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大家开门见山地商量：倘若《力报》遭到不幸，就转移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李长青还分别向大家介绍了在农村秘密串连的情况，大家还对一些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临分手时，长青同志还一再嘱咐大家要提高警惕，谨防国民党反动派下毒手。

随后，报社以游麒麟洞为名，约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商量此事。大家认为《力报》要顶住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坚定地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但也要注意方法和策略。对引用新华社的电讯、转载《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纸的稿件时，要适当改变词句和语气，不留痕迹，不留口实；同时，要研究中央社、中央日报、大公报以及各大报的战讯，发现破绽，加以利用。聚会后，即按商定的办法注意了策略，如

引用大公报用语：“临胸告急，国军一师悲壮牺牲。”既找到了大报依据，也使读者一目了然地得知各地战场真实战况，特务们却无空可钻，无隙可乘。

即便如此，特务仍不断来找麻烦。八月二十九日，《力报》二版转载了合众社记者雅各在香港《华侨日报》发表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甚于抗战时期》一文后，军统文化军事组组长杨子义以为发现和抓住了什么问题，跑到《力报》编辑部“兴师问罪”。当时，编辑下班了，排字工人李思泌（思齐的族弟）站出来说：“是这么回事，当时排版后，还空一小块，编辑们都走了，我只好临时从《华侨日报》上剪了这么一块来补上。”说完，把剪了的《华侨日报》给杨看，杨无话可说，只好没趣地走了。

由于报纸纸张质量太差，铅字又旧又缺，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和报社经济的好转，大家决定推选思齐出面向黔元纸厂交涉纸张的供应，由我通过刘安民的老关系到赫章铅锌厂赊购一吨铅块来铸字，同时，我也藉此机会去与刘安民、李茂才、陈国斌在赫章、威宁、水城交界处已组织起的一支武装队伍取得联系，作为转入武装斗争的准备。九月初，我邀集大家在大十字冠生园聚餐，并作了简单交代后，就和刘安民一道经安顺、岩脚去赫章。

九月六日，《力报》刊登了《从京沪各报看最近战局情形》附题为《战争南移到中原，形势严重》的社论。这篇文章的原题是《从京沪各报消息看刘伯承将军南下姿态》，在集体讨论时，从策略上考虑而作了修改。但国民党反动派却以此作为迫害《力报》的藉口，九月九日，民政厅长袁世斌把李思齐找去质问：“《力报》公然为共产党宣传，你们的报纸办到哪里去了？”旋又劝李改变立场，为时未晚，要求

李接受黄国桢原来所提的三个条件，真是软硬兼施。李思齐当然不吃这一套，断然拒绝。其实，国民党特务早已周密部署了查封《力报》，逮捕《力报》主要成员的阴谋和计划，袁世斌的谈话就是这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当李思齐离开民政厅走到威西门报国寺附近皂角树脚时，即被逮捕，同时抄了李思齐的家，抄去《资本论》等进步革命书籍若干册。同一时刻《力报》被查封，门上贴的封条写了八个大字“为匪张目，勒令停刊”。同日上午，顾希均从报馆回家，准备接待从重庆来的黄世琮，黄是来和希均商议到盘县着手武装斗争准备工作，并受董国平之托，来贵阳与希均商谈购买电台之事。午后，客人尚未到，忽听门外有人叫希均的名字，希均未穿外衣去开门，即被逮捕，世琮幸未遭遇。特务们架着希均走过中华南路时，洪之贵迎面走来，希均使个眼色，昂首而过。之贵急赶至蒙昭、毛有光、王钰处商量对策，大家认为《力报》要稳住阵脚，应于次日发表呼吁书，呼吁社会舆论营救顾希均，要求国民党当局放人。当毛有光、洪之贵先后赶回报馆接近门口时，毛有光见报馆门上有封条，立即折回躲避；洪之贵因深度近视，尚未发现门上的封条，即被逮捕。报社其他同事闻风走避。

《力报》从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改组至九月九日被查封，虽然只有短暂的七十天的战斗历程，但作为一家真正的代表民意的名副其实的民间报纸，抨击蒋管区反动派的时政，宣传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震动了反动派，密切配合解放战争，互相呼应，唤醒了蒋管区的人民群众，在贵州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贵州解放牺牲的同志永垂不朽！

本文所记史实，时隔三十九年，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希参与其事的同志补充和指正。

贵阳《力报》事件

刘裕远

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遗教，倒行逆施，贪污腐化，祸国殃民。一些有志的爱国青年，为了寻求真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们默察深思，分析比较，在寻找真理的同时，与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认识和斗争实践中，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咀脸，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从而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贵阳《力报》事件就是这一时期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事件，它反映了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的成长和所走过的道路。笔者当年曾参与创办贵阳《力报》，仅就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记述这一事件，以供研究参考。惟事隔多年，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者予以指正。

《力报》原是湖南出版的一家报纸。一九四四年秋，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我湘、桂地区，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相继沦陷，继而黔南独山失守，《力报》在抗日烽火中从湖南迁来贵阳出版。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力报》社长雷锡龄急于复员回乡，不愿继续办报，欲将发行权转让。这时，正在重庆徬徨无路的李思齐，接到贵阳友人来信

告知《力报》转让的消息，李思齐即找我商量，意欲接办《力报》，得到我的赞同和我二哥刘熙乙的支持，以十余两黄金的顶价，将《力报》的发行权接收过来。我和刘熙乙还将我们原办的熙明印书馆的工人及全部机械设备、纸张、房屋拨归《力报》使用，还拨给了《力报》一笔基金。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我和我二哥经营的企业多了，所谓“树大招风”，有张报纸能为我们公开说话，这对于我们是有很大大好处的。李思齐则以这张报纸作为他的事业基础，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经过筹备，由李思齐任贵阳《力报》社社长，程晓华任副社长，沈天水任总编辑，编辑部和印刷厂设在威清路（今银行宿舍），后迁到石板坡礼义路八号；设经理部于中华中路，由刘荣康任经理。旧社会办报，还必须得到索有声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支持，《力报》是贵阳唯一的民办报纸，经过研究，敦聘贵州省参议会议长平刚为发行人。平先生说：“你们要办报，不能做官报的尾巴、应声虫，要有正义感，要敢于说话，要独树一帜。”得到平先生的应允，《力报》即以平先生的指示为办报宗旨，于一九四五年冬请周伯敏改写了报头，继续出版。本文在《力报》前加上贵阳二字，以示与前《力报》之区别。

二

贵阳《力报》自接买后至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存在了约二年的时间，都是由李思齐主持该报。其间经过几次改组，每次改组都意味着该报的立场在逐渐转化，而这些转化实际也是李思齐的转化，因此，有必要记述我所知道的李思齐这个人。

李思齐，一九一八年出生贵州水城妈戛的一个地主家

庭，幼时在水城县区立两级小学校毕业后，一九三一年考入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在校加入了国民党以及陈惕庐（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代主委）组织的青年阵地社。毕业后，经陈惕庐派到国民党安顺县党部工作，因与陈的意见产生分歧，继而闹翻。思齐乃于一九三七年辞去职务，去昆明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深造。在校期间，与冯友兰教授过从甚密，并与闻一多、李公朴等教授甚为接近，经常聆听闻、李的讲演，故其思想受到闻、李的一定薰陶和影响。一九四二年秋毕业，一九四三年在贵阳与刘泽中（西南联大教育系毕业）结婚，同年冬，思齐返回水城路过毕节时，被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廖兴序留任为专员公署教育科长。这时，思齐才与我弟兄俩互相认识。因思齐与我同年，彼此更为接近。专署秘书黄通、专署建设科长赵发智、毕节士绅吴颂平与廖兴序、李思齐、刘熙乙和我共七人，结成“金兰”之好，以便于彼此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相互利用。大家商量，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毕节创办《西黔日报》。这家报纸由刘氏弟兄出资，上述七人组成社务委员会，并以廖兴序为发行人，李思齐为社长，另聘大方县杨次青为主编，并请赵发智的爱人周贞一（周素园先生之女，中央大学学生）和思齐的爱人刘泽中参加撰写社论。该报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也抨击时弊，因而得到地方人士好评。在此时期，毕节有一进步青年王芸生因共党嫌疑被关押在专署，家有老母，生活艰难，思齐以爱才为名，接济王母生活，并将王营救出狱。一九四四年夏，思齐给我开了一张读书目录，其中除了《新理论》、《中国哲学史》、《新世训》等书之外，最后列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问思齐：“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他说：“学一学人家是怎样组织的，了解一些情形总有什么好处。”以上两件事。

可以说明思齐的思想转化，已在行动中流露出来。

一九四五年夏，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调职，杨森继任后，大批换人，毕节专员由周希濂接任，廖兴序、黄通、赵发智、李思齐都被换了下来。我们七个人中廖、黄、李三人赋闲，赵发智、吴颂平到贵阳另谋出路，刘熙乙出任贵州银行总经理，我在重庆担任“六联办事处”副主任，代表贵州、聚康两银行，仁、永两岸盐号，新黔、黔仁两公司对重庆的分支机构进行业务和人事监督。我把李思齐约到重庆，安排他为“六联办事处”业务专员，实际只是挂个空名支领薪水，他仍从事他的政治活动。这时期据他说，曾去曾家岩拜访周恩来和王若飞两位共产党领导人，可惜没有见到。“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思齐和他的同学程国勋曾帮助卧病的周素园先生（时任国民参政员）草拟提案，内容是主张国共合作，同建祖国，反对内战。周老看后向他们致谢。第二天，周老对我说：“国民党没有诚意，合作是不可能的。我这次来开会，既不想发言，也不准备提案。”以后周老病重住院，思齐也回贵阳接办《力报》。

三

思齐接办《力报》之初，原以《西黔日报》时的七个社务委员为《力报》的社务委员，实际廖、黄二人离开了贵州去外省活动，吴颂平出任剑河县长，只有赵发智和我刘氏弟兄二人尚与思齐密切联系，故七人社务委员会名存实亡。一九四六年，思齐在《力报》比较稳定后，即按既定方针，对贵阳《力报》编辑部进行改组，首先是程晓华辞去副社长职务，沈天水也辞去总编辑，改由程国勋任副社长，曹儒森任总编辑。编辑部的人事大有更迭，胡危舟、沈明道等人先后离去。

冉隆勋、赵克家、夏之明、张怀陆、黄炜、杜松竹、周建章、刘述尧等进入编辑部，经理部调整较小，这时的《力报》，站在爱国立场，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对内镇压，对外谄媚，争权夺利，派性角逐等丑行，予以充分揭露，并发表了《退一步、进两步》、《派性出学校》、《论综合所得税》等社论。尤其是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各报均不表态，《力报》发表了《美国佬，滚回去》的社论，并详细报导各地抗议美军暴行的新闻，以严正的立场，声援受害同胞，抨击帝国主义者在华暴行。

在这段时期，国民党曾指派了两名人员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暗中对《力报》的言论进行控制，思齐对这两人并不买帐，因此来人也没有起到作用。当旧政协中断后，国民党凶相毕露，悍然下“戡乱”令，并令各报在文字上对共产党必须称为“匪党、匪军”，但《力报》置之不理，仍以“共党、共军”称之，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贵州新闻检查处处长李××曾对我二哥熙乙打过招呼，熙乙回说：“我只出钱办报，对于文章如何，我并未过问”，给他软顶回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所谓制宪大会，贵州各派系的头目齐集南京。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部长的谷正纲、谷正鼎弟兄，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一次秘密会，叫做“贵州大团结会议”，其内容是拥护谷正伦回贵州当省主席。为了拉拢各派系头目，谷氏弟兄采取封官许愿手段，在会上把贵州各厅、处、局长和专员的官位都瓜分了，对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选举，也都作了安排。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王亚明、国大代表廖兴序等，因没有分得如意的官位，深为不满，廖将会议内容告知